

马歇尔计划的历史真相： 一种基于史实的解读

王新谦

(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实现全球霸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对战后世界和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深刻且持续, 因此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热点。文章基于史实解读, 回答了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马歇尔计划存在的几种争议, 诸如马歇尔计划肇始时间界定、名称的由来、美国国务院官员对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贡献以及捷克“二月事件”与马歇尔计划是否存在关联等。文章认为, 尽管马歇尔哈佛演讲一直被视为马歇尔计划出台的标志性事件,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在1948年4月之前, 美国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援助欧洲计划; 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 美国决策层固然发挥了引领作用, 但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也功不可没; 捷克“二月事件”是偶发事件, 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但却在客观上为马歇尔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通过提供了助力。文章是对马歇尔计划整体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对深入研究马歇尔计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马歇尔计划; 美国; 欧洲复兴; 捷克“二月事件”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9)05-0040-11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9.05.004

The Truth of the Marshall Pla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WANG Xin-q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Marshall Plan is a core part of the postwar U. S. global hegemonic strategy,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post-war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s profound and lasting. Thus, it has been a research focus in academic fields so far. Based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this paper has dealt with several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Marshall Plan in academic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Marshall plan, the evolution of the name of the pla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officials from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plan and whether the “Czech Coup” in 1948 had any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n. This paper holds that: although Marshall’s Harvard Addres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ymbol

收稿日期:2019-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寻找真实的马歇尔计划”(18FSS010)

作者简介:王新谦,男,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美国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战后美国外交史、冷战经济史研究。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Marshall Plan,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concrete plan to aid Europe in strict sense before April 1948; During the formulat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the American decision-making elite did play a leading role, yet the middle-level and junior officials from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de no less con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zech Coup” in 1948 was an accident with no direct rela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yet it offered aid to the passing of the Marshall Plan by U. S. Congress objectively. The paper is an essential addendum to and improvement on the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further study on this plan.

Key words: the Marshall Pla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recovery; the “Czech Coup” in 1948

马歇尔计划究竟从何时开始酝酿,有没有定论?马歇尔计划为什么是以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而不是以其他人的名字命名?学界传统上认为马歇尔计划是战后初期美国上层精英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和美国民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对欧新政策的出台?捷克“二月事件”究竟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其中有没有苏联因素?在马歇尔计划实施70周年之际,进一步厘清这些年来或存在争议、或语焉不详、或模棱两可的问题,既是对马歇尔计划整体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也对深入研究马歇尔计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是否存在“马歇尔计划”之争

长期以来,关于马歇尔计划究竟从何时开始以及是否真正存在马歇尔计划的争论不仅一直困扰着国内外马歇尔计划史研究学者,在美国政界、商界和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读。就学界而言,很多学者更倾向于把乔治·马歇尔国务卿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政策演讲看作是马歇尔计划的肇始事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47年7月28日,即马歇尔哈佛演讲发表近两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商业政策司司长助理本·穆尔(Ben T. Moore)在发给国务院国际贸易政策司司长、时任美国赴日内瓦贸易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克莱尔·威尔科克斯(Claire Wilcox)的电报中形象地称:“马歇尔计划一直被比作一只飞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有多大,飞向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1]239}即使到了1948年1月美国国会复会后开始讨论美国新的对外援助政策期间,许多美国人仍对马歇尔计划究竟是什么感到茫然。例如,在众议院的辩论中,来自俄亥俄州的议员托马斯·詹金斯(Thomas Jenkins)就说:“天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似乎今天是这,明天是那。显然,它的起源很偶然,而且现在似乎既无目标,又无方向。”^①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存在马歇尔计划,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该计划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二是究竟从何时起美国新的援助欧洲计划才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歇尔计划的酝酿实际上从1946年初就开始了。战后初期到杜鲁门主义出台(1947年3月12日)之前,美国已经提出并实施了种种复兴欧洲方案,并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为欧洲未来整体复兴做准备^[2]。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在国会山讲话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希腊、土耳其,而未提及欧洲整体复兴,原因有二:一是地中海危机在当时显得尤为突出;二是因为杜鲁门对国会和美国民众能否接受对希腊、土耳其援助尚心存疑虑,更何况是大规模援助欧洲这样的大动作。换句话说,就在杜鲁门于1947年春天在国会山发表演讲之时,尽管“希、土危机”只是欧洲危机的冰山一角,但欧洲整体复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进入了美国决策者的视线,只不过在当时人们的脑子里还很模糊,还没有什么“计划”之类的概念。

^①参见: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House, 80th Cong., 2nd Sess., January 26, 1948, Washington D. C.: Library of Congress: 576.

有证据表明,从1946年开始,美国国务院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欧洲重建。据美国外交文献(FRUS)记载,在整个1946年冬天,美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都在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工作。“甚至从1946年春天开始,问题越来越明白,我们需要拿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欧洲的收支平衡局势在日益恶化,保罗·尼茨(Paul H. Nitze)(国务院商业政策司副司长——作者注)一直在催要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情报和分析”^{[1]240}。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对国务院德奥事务司司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说过,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来说明欧洲重建计划的必要性^{[1]241}。还有证据表明,在1946年年初,金德尔伯格司长的助手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曾私下对金德尔伯格说:“没有欧洲的联合,就无法实现德国的统一。而欧洲联合最好是通过经济事务上的技术合作来小心翼翼地实现。”^{[1]241}罗斯托的这一建议后来通过国务院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办公室转给了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美国专栏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兄弟也曾于1946年4月就此做了专题报道。但遗憾的是,当时的这些建议和新闻报道并没有引起贝尔纳斯的足够重视。另一个证据是,就在美国国务院起草援助希腊、土耳其计划期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和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T. Patterson)(陆军部长)也一直在催促艾奇逊尽快拿出一个欧洲总体复兴计划^{[3]214-215}。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1946秋天至1947年初春时节,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持续恶化加剧了美国人对欧洲的担心,也加强了他们复兴欧洲的决心。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马歇尔计划这一概念也随着1947年4月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的第一份全面研究报告(即SWNCC报告)以及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无果而终而逐渐明朗起来。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三个关键人物。首先,美国复兴西欧的想法与美国遏制政策的总设计师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是分不开的。还在国防大学教书期间,外交家出身的凯南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西欧危机的严重性。1947年5月,凯南被马歇尔国务卿征调国务院,担任“政策设计委员会(PPS)”主任。上任伊始,他便迅速将目光投向西欧,认为美国必须拿出一个可行的拯救西欧方案。在凯南看来,1947年春天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之所以在德国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主要应归因于苏联的如下几点考虑:一是俄国人^①相信美国不久将出现经济危机,势必削弱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兴趣和影响力;二是盼望法国、意大利和西部德国形势继续恶化,而美国单靠一己之力又无力阻止西欧经济的日益恶化。这种恶化很快就会出现对共产主义有利的局面;三是俄国人相信,没有他们所控制的中东欧地区的资源相助,西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俄国人坚信,只要继续拒绝中东欧资源为西欧国家所用,他们就能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等待美国无力解决西欧经济问题的那一天^[4]。面对苏联的这一政治图谋,凯南的结论是:“为了阻止我国讨价还价能力的进一步削弱,必须改善西欧的局势。”^{[1]240}

其次,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概念的提出与迪安·艾奇逊(时任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副国务卿)也是分不开的。1947年5月8日,受杜鲁门总统的直接委托,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市三角洲议会发表政策演讲,将欧洲的当务之急向美国民众做了说明。他在演讲中谈到了几个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美国国务院反复强调的多边主义问题。他在其中一个问题提到,在未来“以某种计划方式”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将有利于实现欧洲复兴^{[5]278-281}。在今天看来,这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艾奇逊的这次政策演讲既没有关于复兴计划的具体建议,也没有提到由谁来制订这一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设想而已。但必须承认,艾奇逊是第一个提到以某种“计划”方式向欧洲提供援助的美国高层官员。

^①原文是“the Russians”,故译为“俄国人”。下同。冷战期间,美国习惯称俄国人,很少称苏联人。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从目前看到的资料看,他是在媒体上将马歇尔计划称作“计划”的第一人。据美国权威档案文献记载,在一次与副国务卿艾奇逊共进午餐时,赖斯顿请艾奇逊谈谈欧洲复兴问题,艾奇逊提到国务院正在考虑一些“计划”。次日,赖斯顿便在《纽约时报》头版发文,称国务院正在准备一个“宏大计划”。这件事令刚上任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凯南茅塞顿开。他认为,如果在国务院公开讨论这一“计划”,他的政策设计班子正好可以借力开展工作。据马歇尔计划亲历者金德尔伯格后来回忆,他当时也不知道凯南脑子里具体想些什么,但一想起凯南经常和赖斯顿一起共进午餐,他认为,“也许赖斯顿当时就是国务院的联络员”^{[1]242}。至此,很可能是受赖斯顿文章的启发,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官员便开始为准备一个“计划”而忙上了。

综上所述,有一系列证据表明,截止到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甚至一直到1947年9月22日“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总报告》递交美国国务院为止,美国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援助欧洲“计划”。具体证据如下:证据一: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他的“建议”时,他主要概述了美国扩大对外援助的方针和美国的援助原则,他本人当时对于该“计划”的确切定义和目标也不明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用美国学者小查尔斯·米(Charles L. Mee, Jr.)的话说:“美国国务院的计划始终是没有计划,始终是让欧洲人联合起来,拿出点东西来。”^[6]证据二:1947年6月12日,美国国务院在致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的电文中也承认,援助欧洲“方案的范围和性质尚无法预见”,援助路线可能有点像法国战后复兴经济的“莫内计划”,是一个区域性方案,只不过“范围大一些,包括多个国家”^{[1]251}。证据三:由于一直对复兴欧洲的路线图犹豫不决,在克莱顿副国务卿受命赴英国秘密访问之前,美国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备忘录经过了反复修改。该备忘录是6月5日起草的,6月9日进行了修改,在他于6月22日出发之前,再次进行了修改^{[1]247-249}。在英国期间,克莱顿也只是号召欧洲人主动点,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提到什么“计划”。克莱顿告诉英国官员,华盛顿在该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国务院的考虑“实在粗浅”。他还告诉英国人,他所谈的“大多数观点都是他自己想的,他只跟马歇尔谈了一次,主要是关于煤的问题。他不想给人一种感觉,即他已设计好了任何深思熟虑的计划或方案”^{[1]284}。在克莱顿回到华盛顿后,罗伯特·洛维特^①(Robert Lovett)在看过他伦敦会谈的报告时发现,虽然克莱顿的“某些观点优于国务院,但他看不出美国此时有什么方案或计划”^{[1]324-326}。证据四:在马歇尔于1947年6月底和英国驻美大使的谈话中,他自己也把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界定为“只不过是一种暗示和建议,而非计划”^[7]。证据五:1947年7月21日,当凯南将一份题为“马歇尔计划”的备忘录递交马歇尔国务卿时,后者在这份备忘录的“计划”一词上打了个引号,标明:“We have no plan(我们没有任何计划)”^{[1]335}。

由此可见,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把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视为马歇尔计划的肇始和标志性事件,但作为“计划”出现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始于1946年春天的希腊、土耳其危机,逐步形成于1947年,真正成型于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年对外援助法》。由此开始,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才真正进入务实阶段,才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有章可循。而此前的种种努力与设想只能看作是马歇尔计划的前期准备阶段,或可称为务虚阶段。

二、关于“马歇尔计划”名称的由来

马歇尔计划是战后初期美国政治精英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参与了该计划的酝酿与决策。那么,马歇尔计划为什么是以马歇尔国务卿的名字命名,而不是以杜鲁门、艾奇逊、克莱顿或凯南的名字命名?这里边也是大有文章。

^①此时,马歇尔正在南美洲访问,由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临时代理国务卿。

1946年底,因与杜鲁门总统政见不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遂以健康原因辞职。与贝尔纳斯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官员杰西·琼斯(Jesse H. Jones)、弗雷德·文森(Fred M. Vinson)等人强烈要求杜鲁门任命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为新国务卿。然而,考虑到1947年春天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杜鲁门迫切需要一位能得到国会两党共同信任和支持的人出任国务卿,而刚从中国调停归来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就是这么一位最佳人选。尽管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将军既没有迪安·艾奇逊和乔治·凯南的政治经验和外交历练,也缺少威廉·克莱顿的经济头脑和商业背景,但“他是一位完美的组织家和管理者。他的自信足以使像艾奇逊、克莱顿、凯南、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本·科恩(Ben Cohen)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聚拢在他周围”^{[3]200-201}。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杜鲁门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马歇尔担任新的国务卿。

1947年1月21日,马歇尔宣誓就职。在1947年春天美国外交政策面临抉择的艰难时刻,马歇尔可谓临危受命,任重而道远。当然,马歇尔担任国务卿也是众望所归。用美国著名历史学者约翰·布鲁姆(John Blum)的话说:“马歇尔在国内独一无二的声望和人品得到了两党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国会两党领袖范登堡参议员的支持。”^[8]马歇尔的传记作家伦纳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对马歇尔值此关键节点出任国务卿的评价是:“在1947年那种形势下,总统挑选的这位国务卿使人心安——这着棋很聪明。在公众心目中,马歇尔这个名字意味着清醒、坚定地把握时局。哪怕是天塌地陷,他也能临危不乱。”^{[9]390}杜鲁门本人更是对这位新任国务卿赞誉有加,称他“是二战中最重要的人,他还将成为今后十年中最重要的国务卿。他品行坚强,善于组织,慧眼识人,而且秉性谦和,很好相处,所以人们都信任他”^{[9]401}。更有甚者,当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并发表演讲时,有人甚至把他和“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称其为“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质能与他相提并论”^{[9]404}云云。必须承认,当此杜鲁门政府推行新的外交政策和大选来临之机,马歇尔的巨大国际声望和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对杜鲁门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金字招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美国新的援助欧洲计划要以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而不是以杜鲁门或其他人的名字命名。

另据马歇尔传记作家莫斯利后来回忆,尽管杜鲁门总统事前对马歇尔在哈佛发表演讲并不知情,但他却对马歇尔信任有加,且多有暗示。例如,他曾对马歇尔这样说过:“将军,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做某件事,而且必须马上动手,那就尽管干好了,不用等着我或国会认可,事后我再去向议员们做解释。”^{[9]401}显然,杜鲁门总统的绝对信任进一步加强了马歇尔宣布美国外交新政策的决心和信心。事后,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解释将美国新的援助欧洲计划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原因时坦承:“我之所以称它为‘马歇尔计划’,是因为我愿意马歇尔将军获得这一巨大荣誉。他在制定这个计划方面有着辉煌的贡献,正是马歇尔构思出这个建议的全部轮廓。”^{[10]114}

从马歇尔计划的整个酝酿和形成过程看,杜鲁门对马歇尔的上述评论显然有过誉之嫌,因为马歇尔哈佛讲话的大部分看法和观点均来自他的“精英团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1]xi},只不过是借马歇尔之口把它公之于世而已。其实,杜鲁门真正想说的还是后半句:“我相信马歇尔所享有的世界地位使得根据这一政策而做出的建议很容易被采纳。”^{[10]114}这才是杜鲁门把马歇尔的名字和这个计划拴在一起的真实动机。另据曾亲历马歇尔计划全过程的艾夫里尔·哈里曼^①(Averell W. Harriman)后来回忆,杜鲁门总统曾对他说过:“要想使(援欧)计划在国会通过,他需要马歇尔将军的声威和支持。因此,他决定称这一计划为马歇尔计划。”^{[11]16}

总之,不管怎么说,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之后,“马歇尔计划”这个名词便迅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

^①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商人政治家,1943—1945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46年任美国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美国商业部长。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先后任“哈里曼委员会”主席、经济合作署(ECA)驻欧洲特别代表(特使),是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代言人、协调人和忠实执行者。

闻、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介,成了一个通用的、约定俗成的名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三、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对欧洲联合自救的态度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的一大特色是十分倚重国务院。在推出新的援助欧洲政策过程中,杜鲁门政府除了得到国务院高层的积极支持外,美国国务院的中下层官员也居功至伟,他们的建议不仅坚定了美国决策层启动马歇尔计划的决心,而且推动了美国国会、舆论界、民意团体对美国扩大对外援助政策的支持。然而,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这一因素的考察。

在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务院,不仅存在着一个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反苏精英团体,还存在着着一股强劲的支持欧洲联合自救的力量。这股力量主要由国务院中下层官员组成,其中包括:保罗·波特(Paul R. Porter)(美国派驻伦敦经济代表团成员)、沃尔特·罗斯托(国务院德奥经济司副司长)、哈罗德·范·克利夫兰(Harold Van B. Cleveland)(国务院投资与经济开发司副司长)、保罗·尼茨(国务院商业政策司副司长)等。这些人对欧洲联合自救有着一致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影响了美国国内对欧洲区域合作自救的态度,而且有力地推进了马歇尔计划出台步伐的加快。

在国务院这些中下层官员看来,欧洲的联合与区域合作可以为欧洲走向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他们反对美国此前那种旨在复兴单一欧洲国家经济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能重复一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碎片化结构,无法实现欧洲的整体复兴。他们的基本想法是:在欧洲建立一种包括德国在内、尽可能缩小欧洲国家闭关自守、可以解放欧洲企业潜在生产力的联合、统一的大陆经济。在他们看来,不管有没有苏联的支持与合作,美国都应该、也有能力担负起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的领导责任^[12]。

为了详细、明确地说明他们的这一共同想法,1947年1月15日,保罗·波特代表他的同僚向他们的顶头上司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波特在备忘录中力陈,欧洲经济一体化之所以能为欧洲缔造和平,提供复兴的希望,恰恰是因为它在德国问题上开辟了新的视角。从根本上说,德国问题可以被看作是欧洲不团结的症结之所在。只有当各自为政的主权国家架构让位于一个能够充分利用德国资源、拥有“大陆经济”的联合的欧洲时,德国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作为实现这一进程的重要一步,波特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实现鲁尔国际化,对德国主要资源实行国际控制。波特认为,这样做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确保不致德国大国的复活,从而消除德国邻国,尤其是法国的安全和经济担忧,同时又能为德国的复兴扫清道路。上述措施,加上“四大国”安全协定,完全可以为欧洲实现更加自由开放的内部贸易、货币兑换、投资合作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打下坚实基础。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将有助于实现欧洲经济联合,提高生产力,最终实现全欧洲的平衡复兴。波特最后在备忘录中警告说:“要警惕另一种可能,即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限制德国生产,并谋求自给自足。这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样做只能再次唤起自给自足幽灵的复活,阻碍欧洲的复兴,并助长有利于共产分子的政治动荡。”^①

1947年春天,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的上述想法不仅很快得到了美国最高决策层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保守的共和党人的积极响应。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和发言人的约翰·杜勒斯(John F. Dulles)参议员在事先征得共和党领袖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的同意后,就美国对欧政策在美国“全国出版商协会(AAP)”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称,战胜国在为德国的未来计划时,应同时为欧洲的经济联合制订一个计划。“一个分裂成碎片的欧洲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欧洲,而一个采用美国联邦方式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市场,就可以享受

^①参见:Paul R. Porter to Charles Kindleberger, 15 January 1947,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 Group 59, 501. BD Europe/1-1647,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一个大得足以和廉价的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市场带来的好处,美国必须对欧洲予以鼓励和指导。”^[5]^[20]像保罗·波特一样,杜勒斯也支持对德国资源进行某种国际控制。他说:“这样做不仅是朝着欧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目标迈进了一步,还可以使欧洲人为了复兴事业而控制德国的资源,从而使德国不致再次成为欧洲的负担。”^[13]

波特在备忘录中提出的某些建议显然得到了马歇尔、杜勒斯等人的接纳与肯定。1947年3月10日,杜勒斯等人陪同马歇尔赶赴莫斯科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在莫斯科期间,美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国际特别机构,用来监督鲁尔的资源。根据这一提议,鲁尔仍然是德国的一部分,但德国的邻国有权使用其资源。如此可能引起的争议可以通过国际授权,在“大欧洲基础”上加以解决。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马歇尔坚定地告诉俄国人:“真正需要的欧洲解决方案是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解决方案。”^[14]

1947年4月28日,马歇尔、杜勒斯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发表广播讲话,调子仍未变。马歇尔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回顾了“在莫斯科会议上”“四大国”在欧洲联合、中央管理、赔款和安全问题上的争议,指责苏联反对欧洲经济的平衡复兴。他强调指出,对鲁尔的国际控制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并强调了把一个复兴后的德国纳入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他说:“这样做,既能刺激欧洲的生产力,又可减轻占领国的占领开支负担,还可抵制欧洲大陆的经济分裂势力。”^[15]杜勒斯在讲话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代表团认为鲁尔是欧洲而不是某一国的财产。他建议“全欧洲”都来参与监督,以确保进入该地区的平等权,并阻止它的资源再次成为“德国人控制的经济俱乐部”。他的结论是:“随着我们对德国问题的研究,我们越发相信,走纯粹的国家路线找不到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欧洲的福祉计,加强经济联合绝对必要。”^[16]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报人和民意领袖也都得出了同一结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就在杜勒斯发表演讲后不久,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参议员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E. Stassen)一改初衷,开始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在欧洲建立关税同盟的援助方案表示支持^[17]。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埃尔伯特·托马斯(Elbert D. Thomas)和众议员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也联名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呼吁欧洲国家将经济和政治联合起来^[18]。1947年4月18日,八十一位美国社会名流联署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联合的欧洲”的文章,呼吁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以自救^[19]。美国的报人也不甘落后,纷纷在《圣·路易斯邮报》《华尔街杂志》《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星报》等报刊发表社论。美国著名专栏记者、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沃尔特·李普曼还为此专门在《华盛顿邮报》上开辟了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专题文章,支持美国劝导“欧洲联合”的运动^[20]。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认为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零敲碎打地、零星地分给各个国家。必须整合这种援助资源,用来支持欧洲经济重组和实现欧洲整体复兴。他还提议,欧洲人应在一个总的生产和交换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且尽欧洲大陆之所能,在共同赤字问题上达成一个共同的计划。而美国在支持这一计划时,应首先鼓励“欧洲的联合”^[21]。

总之,上述来自国务院、国会、社会名流、报人的看法和呼吁契合并加强了美国政界,尤其是国务院支持欧洲联合自救的想法。这样,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之前,美国上下在欧洲联合复兴问题上达到了空前一致。这些主张欧洲联合的美国人希望美国政府能拿出更多的援助来促进欧洲提高生产力,挽救多边主义理想,化解德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矛盾,并帮助西欧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最终实现美国的多重外交政策目标。尽管在1947年春天还没有人提出一个详细的蓝图或计划,但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共和党人、社会名流、各主要媒体、有影响的报人都在竭力兜售这一主张。毋庸置疑,美国国内的这一支持欧洲联合运动成了美国政府决策层制定新的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也为马歇尔哈佛演讲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基础和力量源泉。马歇尔在后来的哈佛演讲中提出的许多援助原则以及后来马歇尔计划在国会的顺利通过,不能不说受美国国内这一支持欧洲联合运动的巨大影响。

四、捷克“二月事件”与马歇尔计划

1948年2月中下旬,捷克斯洛伐克政局突变,爆发了著名的“二月夺权事件(Czech Coup)”,也称“二月事件”(以下简称“二月事件”)。这一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东西方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1948年1月,美国国会例行复会,政府迅速将马歇尔计划立法草案提交国会进行辩论与听证。在听证期间,美国政府仍面临着来自国内保守势力不小的阻力,反对美国扩大对外援助的力量依然存在,美国决策层在等待像杜鲁门主义出台前斯大林莫斯科“2·9讲话”那样的“帮忙”机会。例如,当时的国务院官员奇普·波伦(Chip C. Bohlen)在写给他的挚友、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的信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一愿望。他在信中表示,希望俄国人能“继续做好事,不要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因为这样会毁了马歇尔计划”。^①他甚至以挑唆的口味问德布罗,能否“挑起俄国人加快攻击美国,因为过去这对国会情绪的影响一直十分有效”。^②

就在这种背景下,1948年2月20日,捷克国内爆发了政治危机。亲西方的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人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赶出联合政府,史称“二月夺权事件”。捷克“二月事件”让美国决策层大喜过望,美国国内反共势力乘机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旨在为马歇尔计划在国会获得立法支持造势。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就连一向温和的马歇尔国务卿也推波助澜地说:“要是美国不支持欧洲自助,(欧洲)走向暴政统治很可能是无法回避的。”^{[22]29}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e)(时任美国陆军部长)也公开表示,鉴于捷克发生的政治事件,马歇尔计划很可能起到阻止共产党在意大利和法国东山再起,继而夺取政权的作用^{[22]403}。美国国会众议员汉密尔顿·费希(Hamilton Fish)更是赤裸裸地说:“我不喜欢吞吞吐吐,或把事情隐瞒起来。这个法案的整个目的就是遏制、限制或阻止正在推进的共产主义。”^{[23]1398}他要求政府干脆点,直接对西欧国家说:“我们希望你们加入反对苏联侵略的防务联盟。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大力支持你们。”^{[23]1398}

捷克“二月事件”造成的“可怕后果”以及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的日益临近进一步消除了美国国会内保守派此前对马歇尔计划的种种顾虑。随着马歇尔计划稳定西欧经济和反共目的日益明朗化,美国国会内以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参议员为首的共和党保守势力也开始转变立场,转而支持马歇尔计划。

正值美国政府提交的议案在参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捷克发生的另一件事再次帮了美国人的大忙。颇受捷克人民拥戴的捷克非共产党外长让·马萨利克(Jan Masaryk)突然自杀了。1948年3月10日清晨,有人在布拉格契尔宁宫的一幢四层楼窗下发现了马萨利克血肉模糊的尸体。马萨利克是当时捷克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亲西方人士,世界舆论迅疾对他的暴毙做出了种种猜测。马萨利克事件的可怕政治背景再次令美国人感到不寒而栗,对共产主义的猜疑与恐惧再次显示了巨大威力。3月13日,参议院以69票对17票通过了代号S2202的马歇尔计划政府议案。在参议院通过政府议案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顿(Charles A. Eaton)很快表态,支持马歇尔计划尽快在众议院通过立法。

为了对众议院继续施加影响,游说其尽快通过马歇尔计划,1948年3月17日,杜鲁门再次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借口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特别咨文,并向全国直播,以便家喻户晓。在这次讲话中,杜鲁门再次对苏联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有那么一个国家,不仅在缔造公正、体面的和平上拒绝

^①参见:Bohlen to Elbridge Durbrow, 23 December 1947, RG 59, Bohlen Papers. Box 1,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②参见:Bohlen to Elbridge Durbrow, 23 December 1947, RG 59, Bohlen Papers. Box 1,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合作,而且企图阻止和平的建立”。这个国家“始终无视并破坏国际协议,在联合国安理会滥用否决权,仅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否决了21项提案”。大概嫌不点苏联的名不足以让人明白他指的“那么一个国家”是谁,杜鲁门接着开始指名道姓:“自战争结束以来,苏联及其代理人破坏了一系列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独立与民主。正是这一残忍的行动方针以及把它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明显企图对今天的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杜鲁门刻意把欧洲的局面描绘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称:“希腊正面临来自周边共产党国家积极支持的叛乱分子的军事进攻……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极可能在4月的大选中获胜,野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如今,捷克又发生了‘二月夺权事件’和外交部部长自杀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惨死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与此同时,苏联又在向芬兰施压,逼其就范,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处在危险之中……欧洲正在发生的这些改变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24]5-6}杜鲁门接着呼吁众议院尽快批准马歇尔计划。他说:“这一计划是我国对欧洲自由国家援助政策之根本。该计划的通过,是我们为缔造和平所做出的最具说服力的贡献。”因此,“行动越快越好。现在是美国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了。我坚信美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向自由国家提供为形势所必需的支持……行动固然有风险,但不采取行动,风险会更大”^{[24]6-8}。最后,杜鲁门鼓励众议院向参议院学习,称:“参议院不顾党派政治考虑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是民主高效的典型例子。现在,时间至关重要……一天也不能再无为地浪费掉了。”^①

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这篇咨文实可谓慷慨激昂,语惊四座。在一片“反对苏联威胁欧洲”的喧嚣声中,美国众议院立即根据自己的议案(代号HR1585)展开辩论,并于3月31日以329票对74票压倒多数通过该议案。^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马歇尔计划上的不同意见也很快消弭。4月2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该案由杜鲁门签署生效,代号为PL472^[25]。

这里需要回答的是,究竟克里姆林宫是否插手了捷克“二月事件”?据史料记载,捷克危机发生后,美国驻布拉格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Laurence Stanhardt)立即向华盛顿发回秘密报告,详细叙述了导致捷克剧变并最终“捷共”夺取政权和镇压反对派而告终的捷克国内政治动态。斯坦哈特实事求是地认为,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鼓动这一事件,也没有在这一事件中起主要作用。捷克共产党人的得手主要是利用了他们对内政部和国防部的牢牢控制权,也利用了政治对手的错误和弱点。斯坦哈特认为,如果一定要说苏联在这一事件中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捷克共产党人相信,一旦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击,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出面进行干预。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看来,不管捷克“二月事件”的起因有多么独特,也不管苏联有没有直接插手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捷克共产党的胜利是以苏联近在咫尺的武装力量为后盾,而且他们的行动也为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开了可能模仿的先例。美国担心捷克“二月事件”随之产生溢出效应,在攸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西欧国家也诱发类似政变。1948年3月8日,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司长杰克·希克森(Jack Hickerson)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明确表达了美国的这一担心。他这样写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轻松上台和芬兰危机的可怕后果正在欧洲蔓延。大选在即的意大利处在紧要关头。法国政局不稳,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奥地利的政局也是如此。自由欧洲的士气必须加强,这种力量只能靠美国的行动。”^{[26]40}

后来的事实证明,捷克爆发的“二月事件”并没有导致美国官员担心的那种后果,即苏联会进行军事挑衅或准备发动战争。尽管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D. Clay)在1948年3月5日的电报中重新评估了美、苏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和平能否再延续两个月也做出了种种预测,但不管是克莱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士都客观地认为,此时的苏联人并不想诉诸战争,也不可能诉诸战争。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承认捷克共产党夺权事件和苏联施压芬兰与之

①参见: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17, 31 March 1948,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②参见: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17, 31 March 1948,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缔结互助条约造成的危机会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但它认为,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表明苏联会突然增加(向西方发难的)可能性,也不表明苏联现行政策或战术会发生什么变化”。^①美国国务院鹰派人物、欧洲事务司司长希克森也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对付公开的外来侵略,而是要抵御以捷克为榜样、来自外部势力支持的(西欧)内部‘第五纵队’的挑衅。”^{[26]40}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问题上,即使在苏联可能突然对西方进行挑衅,乃至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被排除后,捷克“二月事件”的政治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1948年春天这个多事之秋,恐怕没有什么比西占区合并、德国货币改革、鲁尔煤矿共管和成立一个德国临时政府更重要的了。同样,欧洲复兴计划和欧洲未来均势之关键也取决于伦敦外长会谈的成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如是说:“最根本的问题关乎西德是否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整个德国成为苏联卫星国,关乎我们是否把‘铁幕’推进到莱茵河,关乎我们是否让俄国人拥有德国这一潜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宝库。”^{[26]70-73,113}

总之,捷克“二月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苏联人插手了这一事件。捷克“二月事件”产生的最重要后果有二:一是它确保了法国同意美国复兴西部德国,并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整合到欧洲复兴计划中;二是加强了美国决策者对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的信心。不管苏联是否真的插手了捷克“二月事件”,单就捷克共产党通过非正常手段上台这一事实,就足以使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发生逆转。

综上,本文对上述几个存在争议问题的基本结论是:一,马歇尔计划存在着务虚和务实两个阶段。从1946年初到1948年4月《1948年对外援助法》出台之前,是务虚阶段。在这一阶段,马歇尔哈佛演讲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随着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CEEC General Report)提交美国国务院,随着美国政府将新的政府对外援助议案提交国会辩论、听证,马歇尔计划才初步成型。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仍不能称为“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媒体这么称呼而已。从《1948年对外援助法》于同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至1951年12月底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结束,这一时期才可以称为马歇尔计划,规范的称呼更多地使用“欧洲复兴计划”。换句话说,尽管马歇尔计划从1946年初就开始酝酿,但在1948年4月之前,就连美国官方也一再表示:“我们没有计划。”^{[1]335}二,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美国决策层精英发挥了主导与引领作用,其中很多人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这些精英人物包括马歇尔、克莱顿、凯南、艾奇逊、阿瑟·范登堡等,尤其是克莱顿和凯南。然而,美国扩大对欧援助的计划却是以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这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战后初期,马歇尔的国际声望和在美国国内的知名度如日中天,尤其是杜鲁门和国会两党都非常信任马歇尔。借马歇尔的大名命名欧洲复兴计划,既容易得到国会两党的认可,也易于取得美国国内民意的支持,尤其是来自保守势力的支持。三,战后初期,基于对美国前期种种援助欧洲复兴方案失败的反思,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支持欧洲联合复兴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不单存在于政府决策层,美国国务院的中下层官员是当然的一支生力军。由于这些人的奔走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商界领袖、社会名流、媒体人纷纷站出来支持马歇尔计划,这就为《1948年对外援助法》在国会的顺利通过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四,基于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基于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战略需要,即使没有像捷克“二月事件”和捷克外长马萨利克暴毙这些突发事件,美国也会推出新的对欧援助政策,出手援助西欧国家。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证据看,捷克“二月事件”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苏联人插手了当时的捷克政治。然而,这些事件在特定节点的爆发再次为美国攻击“共产主义威胁”提供了借口,客观上消弭了美国国会内保守势力对马歇尔计划的不同意见,为《1948年对外援助法》在美国国会的顺利通过提供了

^①参见:CIA, 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10 March 1948, Box 203, PSF, Truman Paper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难得的外部助力。

参考文献:

- [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III[G].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 [2] 王新谦. 马歇尔计划: 构想与实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7-33.
- [3] FOSSEDAL G A. Our Finest Hour: Will Clayton,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KENNAN G F. Memoirs, 1925 ~ 1950; Vol. I[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329-330.
- [5] JONES J M. The Fifteen Weeks; February 21 ~ June 5, 1947[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5.
- [6] MEE C L. The Marshall Plan: The Launching of the Pax America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16.
- [7] CROMWELL W C. The Marshall Non-Plan, Congress, and the Soviet Union[J].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79, 32(4): 429.
- [8] BLUM J, MORGAN E S, ROSE W L, et al.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65[M]. Tro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1977: 718.
- [9] MOSLEY L. Marshall: Hero for Our Times[M]. New York: Hearst Books, 1982.
- [10] TRUMAN H S. 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 ~ 1953; Vol. II[M]. New York: Da Capo Press, Inc. , 1956.
- [11] HOFFMANN S, MAIER C. The Marshall Plan: A Retrospectiv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 [12] CLEVELAND V B. The United States and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J].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47, 16: 3-8.
- [13] DULLES J F. Europe Must Federate or Perish; America Must Offer Inspiration and Guidance[C].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47, 13: 234-236.
- [14]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Germany 1947 ~ 1949: The Story in Documents[G].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329-330.
- [15] MARSHALL G C. Address by Marshall[J].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47, 16: 919-924.
- [16] DULLES J F. We Cannot Let Ourselves Be Stymied; Report on Moscow Conference[C].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47, 13: 450-453.
- [17] STASSEN H E. Production for Peace[C].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47, 13: 521-523.
- [18] COFFIN T. Senator Fulbright; Portrait of a Public Philosopher[M].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 1966: 101-102.
- [19] United Europe[N]. The New York Times, 1947-4-18(12).
- [20] BEUGEL E H. From Marshall Aid to Atlantic Partnership; European Integration as a Concer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 New York; Elsevier Pub. Co. 1966: 101-102.
- [21] LIPPMANN W. Cassandra Speaking[N]. The Washington Post, 1947-4-5(9).
- [22] U. S. Congress. Minute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arings on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G].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1948.
- [23]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RP Hearings in Executive Session[G].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s, 1948.
- [24] World Peace Foundation.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8; Vol. X[G]. Washington D. C.; U. S. National Archivers, 1960.
- [25] PRICE H B. The Marshall Plan and Its Meaning[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70.
- [2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III[G].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